



今天我们要说一本杂志,它是偷偷看的闲书、厕所读物,还时常伴随着“啤酒饮料矿泉水”一起出现在绿皮火车的推车里。

没错,我们要说的就是《故事会》。

在很多人都以为它已经歇菜的今天,它还坚挺地维持着每月五六十万的销量。

它的过去更为辉煌。1985年的时候,《故事会》曾卖出单期760万册的销量,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行本发行的峰值。

这本曾经呼风唤雨的杂志,编辑部就呆在安静的绍兴路74号,刚刚度过58岁的生日。它所创造的影响力早已穿透上海,走向全国,甚至还有海外学者以此作为长期研究对象。

对于50、60、70、80甚至90后来说,《故事会》或许就如某位B站up主所言,“是一种启蒙”,“对于当时年轻的社会或者年轻的我们,都是一种文化输出”。

并且,可能曾是上海最强文化输出。

这本上海特产的小杂志,影响了半个世界

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



(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“上海市民生指南”;SHERLife)

1



最新两期《故事会》红版上半月发行绿版下半月发行

厕所)总归手里要拿个东西,有这个习惯。”

“有人说故事会是民工(读物)。所以你家里要装修的话,你把《故事会》带给装修师傅看,那是最受欢迎的。”

夏一鸣的话不是瞎说的。

十多年前,《故事会》发行部门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:广东的《故事会》销量较大,常是供不应求。但在每年春节前后,出现滞销。但同一时间,四川、安徽、湖南等地又供不应求。调研结果发现,春节前后的《故事会》读者,从劳动力输入省份流向劳动力输出省份。

《故事会》的影响力越是偏远地区,越是高渗透。

1987年,一群上海作家到云南红土高原上

的边寨采风。在当地村民家中,主人按照当地风俗,将第一杯酒敬了“最尊贵的客人”,而这位客人就是当时《故事会》的特约编辑吴伦。

尴尬的是,采风团里有的是文坛上德高望重的名人。但在村民心里,《故事会》才是最贴近他们的。

网红鼻祖“凤姐”喜欢读《故事会》曾是互联网上的一个段子。并且一直到她去了美国,还被网友拍到在美国地铁上看《故事会》。

凤姐为什么爱读《故事会》,得从她的童年说起。

凤姐是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人。据她说:“在我小时候记忆里,我很少有时间和小朋友玩,永远都有一堆事等着我去做:带妹妹、割猪

草、喂猪、烧水……”

凤姐说自己喜欢看书,而故事会是一本“在农村永远最容易获得的书籍”。

神奇的是,下到无数县镇的《故事会》,另一端接向了国际。

在2002年韩国召开的世界期刊联盟亚大会上,和美国《读者文摘》、《国家地理》、法国《ELLE》一起同台的,也是这本来自中国上海的《故事会》。

它是一本现象级的国民刊物。

2

为什么这么一本带有乡土气息的刊物,会出现在上海这么个大都市?

这得从历史说起。

在1960年代初“把革命故事作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有力武器”的背景下,上海流行起了讲故事的活动。

在这股社会热潮中,各地都有专门宣讲红色故事的故事员。其中上海和抚顺是两大中心。1963年底,上海市已有故事员近2000人。

讲故事需要脚本。随着讲故事活动的如火如荼,脚本不够用了。

而上海的特色,是文艺工作者人数比较多,也有办刊物的传统。上世纪30年代,中国有2000多种期刊,其中上海就有1500多种。

于是,《故事会》顺应时代需要,于1963年在上海诞生了。

在创刊号卷首,就明确写道:“《故事会》的对象,以农村故事员为主,兼顾工厂和其它方面。”

从1979年开始,《故事会》改变了文学期刊居高临下的姿态,从大人物、大事件、大情节,走向老百姓都在讲的故事。贴近了广大人民,就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受众群体。

1983年11月,湖南省浏阳县文化馆举办了一场17人的座谈会,题目是“谈谈你为什么要把《故事会》?”

这是当地文化馆自发办的活动,因为文化馆的人看不懂,这本老百姓自己出钱订阅的杂志销量,怎么就要成为No.1了呢?

参加座谈会的有当地冻肉厂的青年职工,磷矿技工学校的学生,退休女干部,农业业余文艺作者。

磷矿技工学校的学生表示:“越看越过瘾,成了我业余必须的课外书之一。”

农业业余文艺作者发言:“乡村里有个周三老信说:‘小说和诗我看了半天,还不知哪里刮风下雨,《故事会》一看就记下了,实在好。’”

在互联网出现之前,人们娱乐生活匮乏。当时兴起的通俗文学,也并没有通俗到人人都读得懂、读得进。而《故事会》则是通俗到了人民群众能够口头流传的程度。

就这样,1984年到1986年,《故事会》连续三年发行量居全国期刊之首。

1985年第二期更是达到了巅峰——760万册,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。

1997年据《世界期刊概況》统计,《故事会》位列全球发行量第六位。

该年码洋1.08亿(指全部图书定价的总额),十多人团队创造出的经济效益,相当于当时国内一个中型钢铁联合企业。

1999年《故事会》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。同年发行码洋1.2亿,几乎占上海文艺出版社码洋的一半,而利润占全社利润的62.5%。

一直到2000年初,《故事会》单期的发行量都在400万上下。

作为全国第一个新故事刊物,模仿《故事会》的同类期刊有很多。但《故事会》一直以碾压的态势,傲视群雄。

据中国故事期刊协会年6月的统计,当时全国有52种故事类期刊,月发行量863万册,其中《故事会》的发行量近400万册,不仅占据半壁江山,还甩开第二名10倍之多。

巅峰时期,编辑部每个月收到的个人来稿,有两万多件。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都是用麻袋装好,由专人负责从传达室扛到楼上的编辑部。

据《故事会》现今年纪最大的编辑——71岁的姚自豪回忆,当时堆在办公室的信件,比他人还高,占了六排书架左右的面积。

这种影响力,甚至穿透了监狱的大墙。姚自豪就收到过不止一封从监狱寄来的信件。大墙上,也有服刑人员受到了《故事会》的鼓舞,拿起笔开始了故事创作。

其中的一位杨小海在信件中写道:“如果没有你和《故事会》的关心、爱护还有帮助,或许我还在沦落。”

后来,他的作品先后在《中国青年》、《辽宁青年》等刊物上发表。

“许多读者来信说,看了《故事会》刊登的有关故事,原来吵架不和的夫妇,重归于好了;嫌弃老人的儿媳,孝敬婆婆了;有偷窃行为的小伙子,改好后受到了人们的表扬;搞不正之风的风雨,自动堵上了后门……”

前副主编吴复新在《我们编《故事会》的体会》一文里写道。

3

《故事会》的读者还不止于此。国内外都有人专门研究《故事会》。毕竟是一本历经时代的国民刊物,《故事会》各个时期的特色、品牌策略,所承载的新故事理论,都是值得研究的对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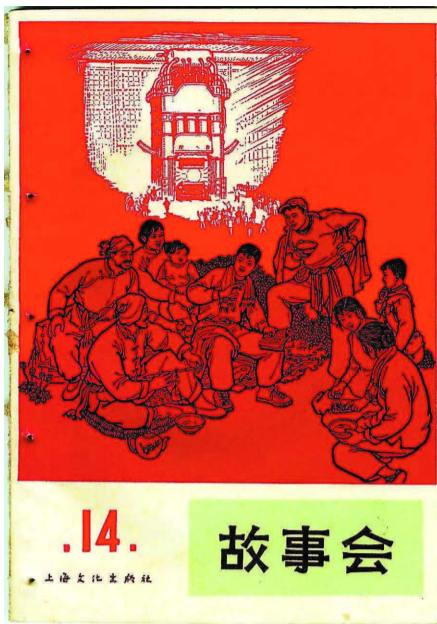
国内苏州大学、安徽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河北大学、山西大学等,都有研究生将《故事会》作为自己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。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还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它的书《解读故事会——本中国期刊的神话》。

而早在80年代初,就有日本学者加藤千代到中国考察研究“新故事”,她也很好奇《故事会》的“成功密钥”。

“这本杂志每到书摊上,很快就被抢购一空,若不预先订购,临时很难买到手……声望如此之高的秘密何在呢……”

回国后,加藤千代发表了论文《新故事的



早期《故事会》的封面



芬兰学者盖玛雅在书报亭捧着多本《故事会》/受访者提供

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收到的成堆来稿

/来自《解读故事会》一书

现状——创造空间的思考”,论文里面有一个章节,专门写《故事会》月刊。她认为《故事会》创造了故事学的“故事会学派”。

远在北欧的芬兰人盖玛雅,今年72岁了,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中东土耳其系教授。

要说她和《故事会》的缘分,比大多数读者都长。

上世纪70年代,盖玛雅在北京大学留学,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《故事会》,还跑去宣传队听故事。

80年代,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当研究员的她,在当地东方博物馆的图书馆里,也看到了《故事会》。

学者就是学者,她从《故事会》里找到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当代生活的途径。

盖玛雅认为,《故事会》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是中国老百姓典型的想法、态度、兴趣、顾虑和乐趣。

过去这些年,她每次来上海都会去书报亭上买上一沓《故事会》,拿回去做研究,也给她带的瑞典学生读。

“很多刊物对一些国外的学生不适合,太难了。”夏一鸣说道。

“有文字上的障碍,又有理解上面的障碍。但是比较下来,《故事会》是最没有障碍的。你要学中文的话,这个是很适合的。”

她还和斯德哥尔摩中文系的课上,让学生把《故事会》里的故事翻译成瑞典语,作为作业。

“虽说要翻译成瑞典语算是很难的,可学生很喜欢。”她在一次会议上分享道。

盖玛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每次来上海都要和《故事会》的编辑们碰一见。甚至和故事作者们也打成一片,是个没有社交恐惧的人。

盖玛雅目前还在写一本关于《故事会》的著作《Gushihui: A popular literature journal that survives》(《故事会》:一本还存活的通俗文学杂志)。

4

除了学术界,《故事会》的影响力还辐射到了文娱界。

在小镇文化沃土里成长起来的五条人乐队,2019年发行了一张专辑《故事会》。专辑的封面和内页整体风格借鉴了杂志《故事会》。

五条人的茂涛说:“可能很多城市的同龄人是从小听欧美摇滚长大的,而我们其实是从小看《故事会》长大的。”

仁科说,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,自己所有的娱乐来源都是《故事会》。

“这张专辑也可以看作是向《故事会》杂志致敬,如果你买了这张唱片,最好再去买一本《故事会》杂志,装订在一起”。

最近的热点人物吴某凡,也是《故事会》的忠实读者。他曾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一直随身携带《故事会》,“坐飞机要带、演出要带、出演综艺也要带”。

他甚至2014年的某条微博文案开头,也被发现灵感来源于当年一期《故事会》的开庭故事。

只可惜,《故事会》倡导的很多朴实价值观——与人为善,善恶有报,这位知名读者,可能并没有读出来。

影视剧《隐秘的角落》原著作者紫金陈,小时候也读《故事会》。

他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石浦镇,一直到考上浙大才走出小镇。

紫金陈小时候就像书里的朱朝阳一样,个

头不高,床头常常放着一本《长高秘籍》。

这是他从《故事会》的广告邮购目录里花10块钱买来的。

即便出了名,还是有网友认为他文笔不好,有浓浓故事会风格。

紫金陈也不悖于这种评价,他曾在采访中这么评价自己的小说:

“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快餐文学,我只希望好看,通过各种技巧,让别人从头到尾一口气看到底,就是我最大的目的。”

在紫金陈看来,他的目标读者,不是“对文学性有要求的”,而是“平时会读通俗小说的那些人”。

这和《故事会》的定位,如出一辙。

5

斗转星移,时代变迁。《故事会》也历经了好几代编辑。

绍兴路74号的编辑部里还有95后。而编辑们都来自国内知名高校,复旦、武大、上戏、香港中文大学等。

不过连年轻编辑也坦言:“基本上新进来的编辑,在没进面试之前,都会觉得《故事会》已经不在在了。”

在娱乐至死的年代里,《故事会》已经显得不够“娱乐”了。

人们的时间更碎片,也被更多新生事物取代了。

“读者现在获取故事的渠道非常多。如果你的套路他在影视剧里都看过了,他还会来翻书看你这本书吗?影视剧都能换台,何况书呢?”80后编辑丁娅瑶说道。

她毕业于上戏的影视文学专业。找工作的时候,她在《故事会》和公关公司中摇摆。最后选择了这份从象牙塔步入社会“不适应感”少一些的工作。

一开始,她挑选的稿子总被退回,因为她选的都是文学性偏高的稿子,“偏向意境,有小说思维在里面,情节比较淡”。

而现在,面对每月近千封的邮件,她很快就会剔除那些对故事没什么用的描写,抽丝剥茧找到一个好的故事核。

老编辑姚自豪,因为《故事会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他还清晰记得以前故事创作班的时候,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招待所里的场景:“大家聊素材、聊构思、讲得非常生动。大半夜还披着被子,聚在一起,就是在这么讲。”一个故事,有那么多人帮他出点子,使构思更加丰富、更加精彩。

所以这个故事,才能越写越活。姚自豪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,从金山罗星中学的副校长兼业余作者,在1996年转行成为《故事会》编辑的。

现在的读者觉得《故事会》跟不上时代,内容质量有所下降。在姚自豪看来,其实是现在的人没有以前那种对故事的热爱了。

不过,也还是有人爱着《故事会》。有浙江的拆迁户,家里三套拆迁房,其中有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《故事会》。

有喜欢1984—1994年间“悲剧故事”的读者,建立QQ群“老《故事会》绝版阅读”,专门分享这一时期的精彩故事。

还有被网友戏称“流水的读者,铁打的阿P”的栏目——阿P系列幽默故事,这个从1987年出现的栏目至今在网上频繁被人提及。

“当时这个栏目很好玩,人物也很有特点。但是没办法归类在栏目里。”夏一鸣说道。于是,阿P成了一个独立的栏目,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家族谱系:老婆/女朋友固定是小兰,儿子是小P,老头、老丈人就叫老P。

他还被赋予了人格——“这个人喜欢赶时髦,爱打抱不平。在出风头、打抱不平的过程中,要做错事情,然后能够自我解嘲。”

“他有市俗的智慧。”这也是很多人喜欢阿P的原因,人们总能在阿P身上照见自己或者周围的人。

今年10月,《故事会》编辑部将从绍兴路搬到七宝。

一本从上海出发的杂志,历经58年历史,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创刊时的预期。它影响了学者的研究方向,创作者的灵感,编辑的人生轨迹,还有每一个曾读过它的普通人。